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器发展中的传承作用

杨建华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夏家店上层文化介于商末周初的北方系青铜器和春秋中期到战国末期北方系青铜器, 继承了商末周初北方青铜器的一些传统, 它们分别来自长城沿线和燕山南北的商末青铜器以及西周时期燕山南麓的北方青铜器。这三个来源的共性是北方青铜器自南向北的流布。夏家店上层文化对东周北方文化带的冀北东部、冀北西部与北方长城沿线的内蒙古地区和甘宁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在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中的传承作用, 一方面可以明确夏家店上层文化一些青铜器的源流以及各地青铜文化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可以明确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关键词: 夏家店上层文化; 北方青铜器; 传承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北方的青铜器文化是一个有自身特色的青铜器群, 分布在介于中原农业文明与欧亚草原畜牧文化之间的北方地带, 是由当地居民创造的独特的青铜文化。整个先秦时代的北方青铜文化出现过两次文化发展高峰, 其表现是数量大, 种类多, 分布广泛, 而且各地的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共性。第一次高峰是在商末周初, 以兽首、铃首和环首的曲柄刀、剑等器物为代表, 第二次高峰是在春秋中期到战国末期, 代表性器物是双鸟回首剑、鹤嘴斧以及动物形装饰的竿头饰和腰牌饰等*。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区、老哈河以及支流地区¹。它的年代主要在西周时期到两周之际, 正处于北方青铜器的两次发展高峰之间。这时的中国北方的东部是发达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西部有年代延续时间很长但是不太发达的卡约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继承了商末周初北方青铜器的一些传统, 并对后来的东周时期的北方青铜器有所影响, 因此这个文化对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传承作用。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在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中的传承作用, 一方面可以明确夏家店上层文化一些青铜器的源流以及各地青铜文化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可以明确夏家店上层文化在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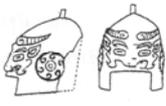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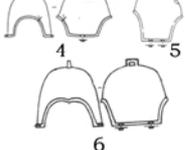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中, 有一些是承袭了商末周初北方青铜器的文化传统。其中一部分是来自长城沿线的商末青铜器; 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当地燕山南北的商末青铜器; 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年代大体同时的燕山南麓的北方青铜器。

A 来自长城沿线的商末青铜器

目前可以确认的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有渊源关系的商末北方青铜器主要来自南流黄河两岸的保德青铜器群²。在保德青铜器群的柳林县高红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青铜盔(图一, 2)。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出土了几件青铜盔。我们把目前发现的几件年代比较确定的盔放在一起进行形态比较, 会发现它们基本的变化规律: 商代晚期殷墟出土的中原式青铜盔只有前开脸, 没有后开口(图一, 1); 高红所属的保德北方青铜器群, 年代在商末到西周中期,

* 由于这时期已经有少量铁器, 这一阶段在欧亚草原又被称之为早期铁器时代。

盔的后部有开口，这是中原式与北方式最大的区别。高红的盔是目前见到的年代最早的北方式青铜盔，盔前开脸很低。西周中期白浮墓葬³出土的盔（图一，3）与高红的相比，前开脸的高度向上提了，开口变大。通过这些不同时期铜盔形态的比较我们发现，盔的基本变化是遮盖的部位越来越小，从而使得带头盔的人的活动更加自如。白浮墓葬中出土的头盔虽然前开脸变高，但是后开口很低，可以看成是中原殷墟头盔的遗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盔形态不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A型与高红的相同，前开脸是圆弧状（图一，4，5）；B型前开脸顶部中间出弧尖⁴（图一，6），这与欧亚草原黑海沿岸库班地区的Kelermes墓葬出土的相似⁵，具有草原文化因素（图二）。按照前面分析的头盔的前开脸由低向高的发展趋势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头盔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是以小黑石沟M8061 为代表，前开脸和后开口都比较低（图一，4），晚期以瓦房中M791 的为代表，前开脸和后开口都向上提高，头盔的内腔变窄（图一，5）。早期头盔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山根类型，晚期的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东南沟类型⁶。东南沟类型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最晚的类型，已经向南发展到了河北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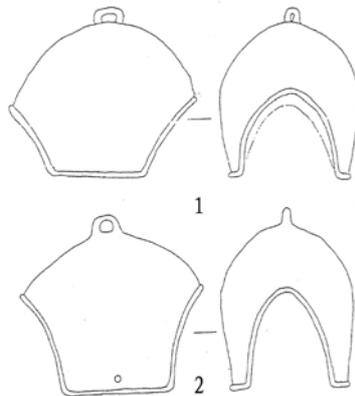
	殷墟	南流黄河	鄂尔多斯	昌平白浮	夏家店上层文化
盔	 1	 2		 3	 4 5 6
镞		 7	 8		 9 10
长体刀	 11	 12		 13	

图一 来自南流黄河两岸商周北方青铜器的影响



图二 凯列尔梅斯出土铜盔

在蒙古的石板墓中出土了青铜盔⁷，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A型头盔相同（图三）。一件出土在Kholtost Nuga的M1，另一件出土在Emgent Khoshuu 遗址的M3，从前后开口的高度看，M1 的早于M3 的盔。而且这两件铜盔还有重量与厚度的差别：M1 的盔壁厚 1.2 厘米，重 1850 克，M3 的壁厚 1 厘米，重 1000 克。这说明盔的器壁厚度与遮盖面积的大小都是这两件铜盔重量不同的原因。所以无论从形态还是重量与厚度看，M1 铜盔的年代当早于M3 的（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对铜盔的分析还受到资料发表的是否全面的限制，还有相当一部分重要信息没有公布）。有意义的是蒙古石板墓出土的铜盔与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A型铜盔相同，这说明同样处于欧亚草原东端的蒙古高原与中国北方在青铜时代的联系非常紧密，它们构成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东端的文化区。



图三 蒙古出土铜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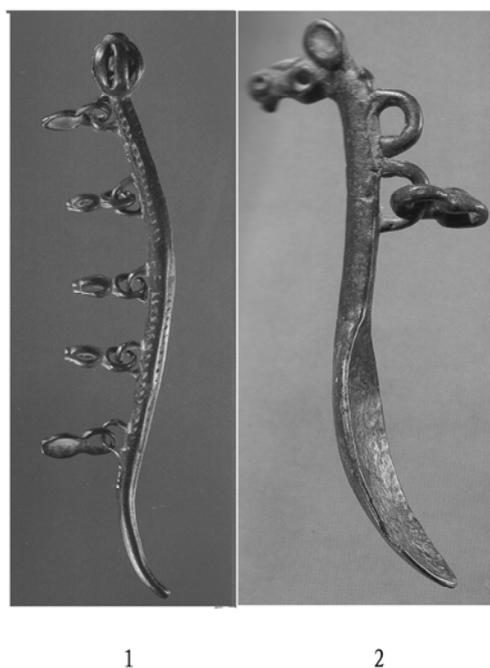
通过对铜盔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北方的铜盔从南流黄河两岸向东北方向传播，到达燕山以南又向北传布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而且还到达更北的蒙古高原。这是一条连接长城沿线到长城以外再到蒙古高原的青铜时代北方青铜器的传布路线。

夏家店上层文化另一件与保德青铜器群有关的器物是兽首马镫。在保德类型发现并发表的马镫有三处：山西吉县上东村⁸、石楼外庄村⁹和曹家垣¹⁰。在这三处发现中，曹家垣的勺形器是征集到的，外庄村的是 1976 年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这两处都只收集到 1 件，

只有吉县上东村的是科学发掘的，墓中出土 2 件完全相同的勺形器，放置在人骨左侧腰部。这些马镫的形状都是蛇首带环勺形，发表时都称作“勺形器”。经过与欧亚草原同类器物的比较，可以确认这是马镫¹¹（图一，7）。保德青铜器群的三处马镫的长度在 9 厘米到 13.8 厘米之间，应该是同一种用途的器物。勺柄还有三个钮。上下钮应该是连接缰绳的，中间的钮是连接马衔的。在鄂尔多斯征集的一件“马首勺”，长 11.7 厘米，勺长 5.4 厘米，也应是同一种用途的器物¹²（图一，8）。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M8061¹³出土了与上东村和鄂尔多斯征集马镫相近的马镫（图一 9），墓中出土 2 件马镫，器身更加瘦长，通长分别为 16.5 厘米和 19 厘米，蛇首变成鹿首，3 个钮变成 4 个钮，钮孔套连的叶状环变成了扁体凸面镂空联珠形饰件。这种由短粗向细长的发展与黑海北岸的马镫是相同的。

在《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这本图录中¹⁴，我们发现了介于保德青铜器群的蛇首勺形马镫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鹿首马镫之间的一些过渡环节。其中的一件“兽首匕”长 10.2 厘米¹⁵，整体形状与上东村的蛇首勺形马镫相近，但是整体更加接近“S”形。马镫上端由蛇首变为兽首，与鄂尔多斯征集到的马首马镫相似（图四，1）。另一件马镫是细长形铃首马镫¹⁶，整体形状与小黑石沟的马镫相似，但是下端仍然保留勺形的遗风。这本图录中的两件馆藏品使得中国北方马镫的演变序列更加完整（图四，2）。



图四 日本馆藏马镫

商周之际北方的马镫的演变与分布再一次证实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继承了保德青铜器群的北方青铜文化传统，它的传播路线仍然是从南流黄河两岸沿长城地带向东，经过鄂尔多斯高原，到达燕山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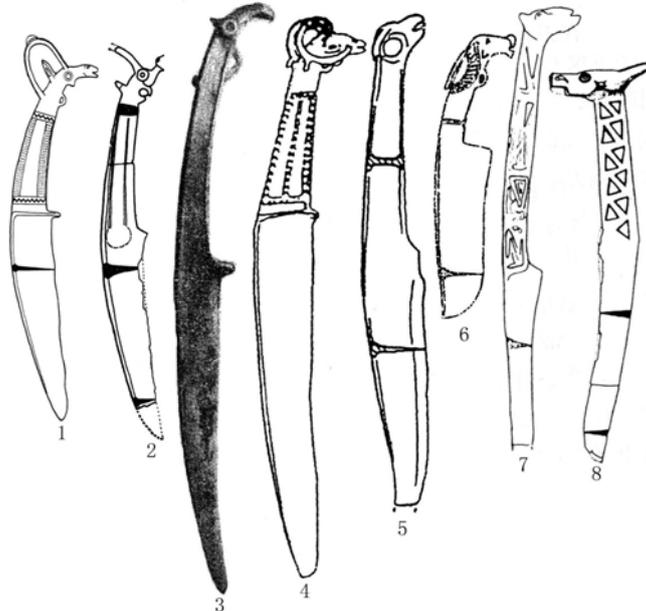
还可以作为这条传播路线旁证的是长体刀¹⁷。这种器物在殷墟由较多的发现，是以长方形“穿”和“内”与柄相联（图一，11），后来传到陕西淳化的黑豆嘴遗存的山西石楼青铜器群中（图一，12）。在石楼青铜器群中与北方文化因素相结合，变成北方青铜器中特有的有“釜”长体刀，这种器物也是从南流黄河两岸向东沿长城地带传播，目前只发现在昌平白浮墓地（图一，13）。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尚未见到这种器物。但是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吸

收很多白浮墓葬中中原与北方结合的器物看（见下文），这种有盨长体刀出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在情理之中。

B 来自当地的燕山南北的商末青铜器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中来自燕山南麓商末青铜器的主要是兽首刀。它是商周之际在长城沿线非常流行的一种北方青铜器，而且在殷墟也有发现。它的演变系列较为清楚。最早的一件为抄道沟的鹿首刀（图五，1）¹⁸，与之相似的还有兴城县杨河¹⁹、绥德塬头村²⁰、殷墟妇好墓²¹和张家口怀安²²等，这说明这种刀子最早分布于长城沿线，而且主要是东部地区。后来这种刀向北传播，与抄道沟的刀较为相近的是朝阳区二十家子²³和奈曼旗东犁²⁴的兽首刀（图五，2,3），这两把刀仍保留了环纽，但刀身弓背不明显了。内蒙古林东塔子沟的兽首刀²⁵的环纽已消失（图五，4）。内蒙古敖汉旗五十家子的羊首刀²⁶和河北兴隆县小河南²⁷的牛首刀已经地方化了，刀柄和刀刃的横隔不明显（图五，5,6），刀身近直。敖汉热水汤²⁸和老南船石砬子M741²⁹上的马首和牛首刀柄上由于已经装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纹饰（图五，7,8），因此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工具。燕山以北的兽首刀，如二十家子、东犁、塔子沟和五十家子发现的刀，都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属于何种考古学文化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兽首刀就是来源于燕山南麓以青龙抄道沟和兴城杨河为代表的商末北方青铜器，它们向北发展，分布到燕山以北，并被后来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吸收。

从兽首刀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商末周初的北方青铜器在燕山南麓的长城沿线，很可能这里是商末周初北方青铜器的发源地，然后逐渐向北传播，经朝阳、赤峰、巴林左旗到奈曼，这支一直延续到夏家店上层文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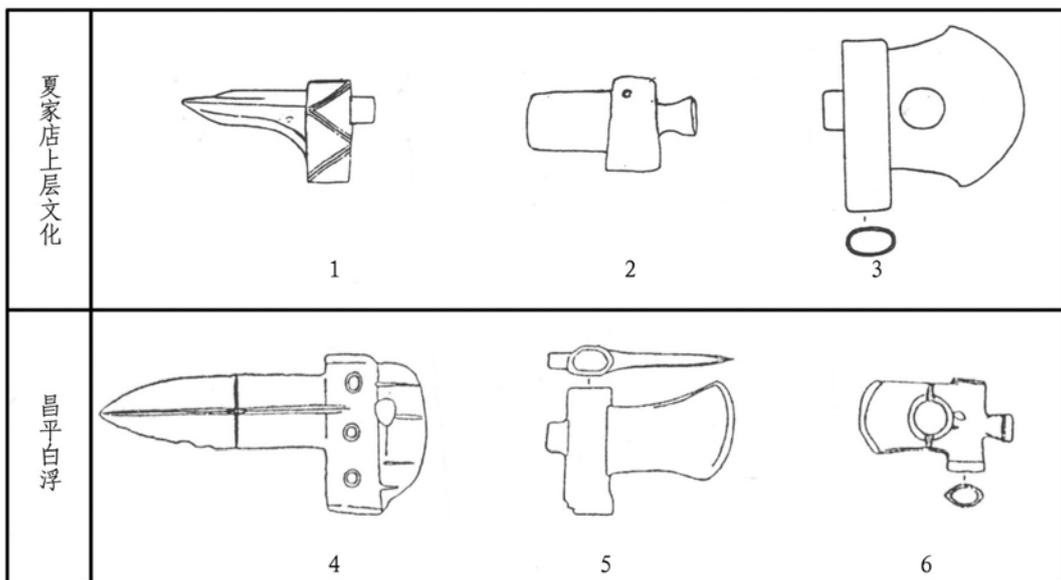
图五 来自燕山南麓的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刀

C 来自周代燕山南麓的北方青铜器

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地域以及文化面貌最接近的当属昌平白浮墓葬的北方青铜器。白浮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来说，更像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中转站，一方面它把来自南流黄河两岸的北方青铜器如高红的铜盃从这里再传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另一方面它又把上一阶段广泛

分布于燕山以南的中原与北方青铜器结合的新器形传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第一方面我们上文已经分析过，在这里着重讨论第二方面。

青铜戈和钺是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在受到境外管銎斧的影响后，在北方地区流行两者融和的管銎戈与管銎钺。但是这种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北方青铜器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前是没有越过燕山的³⁰。只有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由于与中原文化联系的加强，才使得这种器物传到了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具有中原混合因素的器物主要有管銎戈和管銎钺（图六，1，3）。这里的管銎斧斧身宽，刃部呈扇形，明显收到中原钺的影响（图六，2）。这些器物的形制与白浮墓葬中的最为接近（图六，4—6），管銎与器身有明显的分界线，这是由于器身与管銎的厚度不同造成的，说明管銎与器身没有很好的融和在一起，与真正的北方青铜器中的管銎类器物还存在着差别。因此有可能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这类器物是从白浮传到这里的。



图六 来自燕山南麓西周北方青铜器的影响

白浮墓葬中的北方青铜器最有特点的是菌首直柄短剑，这种剑在燕山以北的烧锅营子³¹和小河南³²以及甘肃合水九站³³都有发现，但是这些地点的器物组合完全不同。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种具有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式青铜器特点的菌首直柄剑分布到了中国北方地区，并被白浮的军事首领所采用。

白浮墓葬位于燕山以南，这一地区在西周时期的北方文化是当地的张家园上层文化。而张家园上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分布于燕山南北两侧的北方土著文化，它们之间当有着密切的交往。只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由于西周燕文化的不断扩大发展，没有能够像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那样达到自己文化发展的鼎盛时代就被燕文化逐渐取代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能够理解白浮墓葬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密切联系了。

二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鼎盛时代是在西周晚期与东周早期，例如现在已经发现的南山根石椁墓³⁴与小黑石沟的墓葬³⁵。此后这一文化就逐渐衰退了。这大概与历史记载中的齐桓公伐山戎有关。但是这一文化的影响仍然残留在后来的附近文化中。这些影响按其距离可以分为冀北东部、冀北西部与北方长城沿线的内蒙古地区和甘宁地区。

A 对冀北东部的影响

这一地区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无论是在年代上还是地域上都最为接近。主要的考古发现是隆化县三道营村骆驼梁墓葬、下甸子墓，滦平县荷子沟、窑上墓葬和白旗砖厂墓³⁶。从发表的几座墓看，主要的随葬品是短剑、刀子和服饰品。短剑的种类有銎柄剑、兽首剑、双环首剑和剑格有纹饰的花格剑。刀子的形态主要是齿柄刀和双环首刀。服饰品类有长方形铜管、单体虎饰牌和圆形扣饰。

这一阶段的剑和刀明显地受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例如隆化三道营骆驼梁M8 出土短剑的剑首是一立体的动物（可能是熊），腹下有穿（图七，7）。宁城县南山根 1958 年发现的一批铜器，有两把青铜短剑，各铸一动物立于柄端，其中之一可能是熊³⁷（图七，2），骆驼梁和南山根这两把剑首上的动物伫立姿态基本相同。

最重要的影响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数量最多的銎柄剑和齿柄刀在这里的大量出现。隆化骆驼梁 M5、滦平窑上墓和白旗砖厂墓都出土了銎柄剑（图七，6）。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銎柄剑相比（图七，1），冀北銎柄剑的剑身与剑柄的长度之比所占比重更大，就是说剑身有加长的趋势，而且剑脊有血槽，剑格外凸明显（剑格外凸，呈蝶式护手式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东周时期的銎柄剑的杀伤力更大了。冀北地区的齿柄刀（图七，8）似乎是没加改造就直接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图七，3）那里拿过来使用的。但冀北地区的长方形铜管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不见的，表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没有把针随身携带的习惯，而冀北地区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把装有针的铜管随身携带，挂置在腰带上，这是东周时期整个北方文化带的特点，欧亚草原也具有同样的习俗，这一方面反映了冀北东周时期游动性的增强，另一方面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东周北方文化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冀北东周北方系青铜文化的早期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东南沟类型都分布在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古东南部交界的地区，因此这些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大量的。正是这些影响，造成了东周时期冀北地区的东部与中西部有很大差别，但是随着夏家店上层文化遗风的减弱以及中原影响的增强，冀北地区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别也逐渐消失。

B 对冀北中西部的影响

这一地区有几批墓地资料（军都山³⁸、小白阳³⁹和甘子堡⁴⁰等），但是来自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数量比冀北东部地区少，主要是齿柄刀，而且只是在早期有少量发现，例如小白阳墓地出土过一把这样的刀。新近发表的《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报告⁴¹全面的报道了玉皇庙墓地的发现，从中我们了解到这里玉皇庙墓地随葬的卷曲动物纹牌饰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有承袭关系。夏家店上层的卷曲动物纹饰牌的动物形象有正面与侧面两种，均出土于小黑石沟墓葬（图七，4、5）。玉皇庙文化的卷曲动物纹也分为正面与侧面两种，正面的发现于甘子堡墓地（图七，9），玉皇庙墓地出土了 31 件（报告称“团兽形”大铜扣），均为侧面（图七，10）。

C 对内蒙古地区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早中期的影响

内蒙古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早期的遗存发现数量很少。它的特点是以缝缀的泡饰和不见青铜短剑为代表，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有准格尔旗宝亥社青铜器群⁴²、包头西园春秋墓地⁴³、土默特旗水涧沟门铜器群⁴⁴和伊金霍洛旗明安木独村墓⁴⁵。

这时的随葬品主要有有銎戈、刀、马衔以及服饰品类。其中的服饰品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服饰品中有带扣、联珠饰和铜泡。这种以铜扣缝缀在衣物上的装饰手法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非常流行，并延续到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的早期。从考古发现的位置看，这些扣

饰主要装饰在人身体的上半部。从东周北方青铜文化中期开始,服饰品以带扣和腰饰牌为主,这与骑射和挂置工具武器的需要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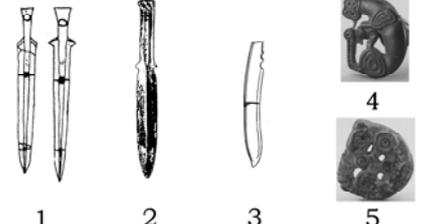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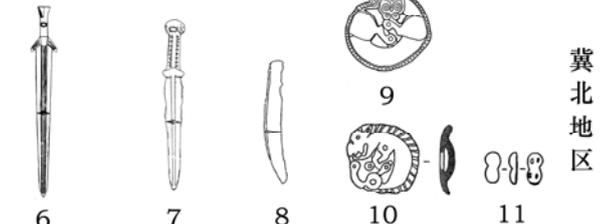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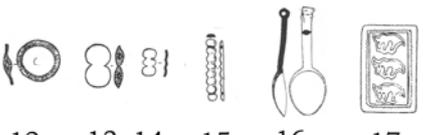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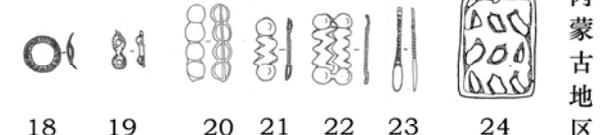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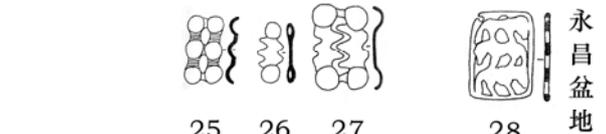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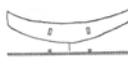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泡饰一种是素面,一种是有放射性纹饰(图七,12)。内蒙古东周时期的北方文化早期有两种泡饰,一种是表面有放射线纹的(图七,18),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相似,另一种是有二三周方点或圆点纹的铜扣,这种纹饰不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而且这种纹饰见于当地中期的带扣上。内蒙古东周北方文化早期还有(宝亥社和西园的装饰物)双联珠饰和铜匙(图七,19,23)。应当是受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如果说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早期以泡饰为主要装饰是时代特征的相似,那么两地都有的带有放射线装饰的铜泡以及联珠饰应当是文化特征的相似。

在相当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东周北方文化的中期,服饰品中以腰饰牌为主。以毛庆沟墓地为例⁴⁶,这种饰牌分为两类,一类是上下对成的鸟纹饰牌,后简化为云纹饰牌,另一类是联珠饰,这应当是夏家店上层文化联珠饰的影响,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独立发展。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联珠饰均为圆珠形(图七,13—15),东周北方的联珠饰有圆珠形(图七,20),也有“之”字形锯齿状的(图七,21),这种“之”字形的联珠饰排在一起,可以咬合在一起,非常紧密,又能弯曲自如,起到腰饰牌的作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联珠饰均为单排,东周北方的联珠饰有单排,也有双排甚至三排的(图七,22),而且多牌的年代更晚,制作粗糙。联珠饰的背钮也不同。夏家店上层文化联珠饰的背面没有明显的钮,可能是将整体固定在衣物上,最明显的是周家地墓地的联珠饰(图七,15)。东周北方文化的联珠饰的背钮一般是在联珠饰的两端(图七,21),这样可以将许多联珠饰串在一起,固定在腰带上。总之,东周北方文化联珠饰的这些变化都说明这时的联珠饰是为了装饰腰带的。但是其形态又是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联珠饰发展来的。内蒙古地区的东周北方文化中期还有一种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似的器物——三马牌(图七,17,24),见于桃红巴拉和忻州窑子等地,数量不多,但是分布比较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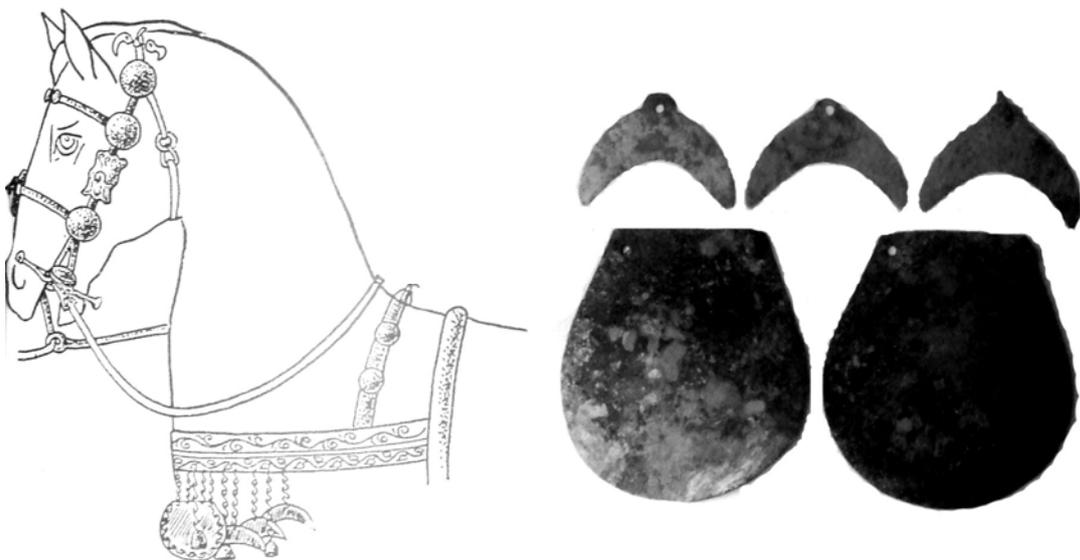
D 对甘肃宁夏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早中期的影响

这个地区距离夏家店上层文化最远,影响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与沙井文化的联系。新近发表的《西岗柴湾岗》的考古报告⁴⁷使我们对沙井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沙井文化有大量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内蒙古东周北方文化相似的联珠饰和三马牌饰(图七,25—29),而以固原杨郎马庄墓地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只有简化的云纹饰牌,基本不见联珠饰。

在庆阳城北发现的一座葬马坑,出土的65件马甲饰(图七,30)⁴⁸,形状与内蒙古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宁城县天巨泉M7301出土的“月牙饰”⁴⁹非常相似(图七,29),可以看成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对这一地区零星的影响。天巨泉M7301月牙形器的尺寸是:长18.5、最宽处5.85、厚0.25厘米。庆阳出土的长的两组为22件长16.2—20,宽2.8—3.8,短的三组43件长13—16.5、宽2.5—4厘米。这种马甲饰我们在欧亚草原也见到,并且复原了它们的用法(图八)⁵⁰。

夏家店上层文化	东周北方文化带
 <p>1 2 3 4 5</p>	 <p>6 7 8 9 10 11</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冀北地区</p>
 <p>12 13 14 15 16 17</p>	 <p>18 19 20 21 22 23 24</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内蒙古地区</p>
	 <p>25 26 27 28</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永昌盆地</p>
 <p>29</p>	 <p>30</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庆阳地区</p>

图七 夏家店上层文化对东周北方文化带的影响



图八 欧亚草原马甲使用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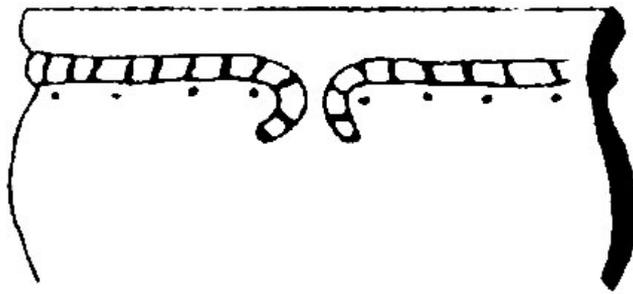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衰落，但是仍然对春秋中期兴起的东周北方文化带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直接的影响，即当地的器形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基本相同。这种情况主要见于东周北方文化带的早期，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对冀北的东部地区，有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最主要的釜柄剑和齿柄刀；对内蒙古地区的影响有泡饰、联珠饰和铜匙。第二种情况是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器物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自身需要，并成为该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主要见于内蒙古地区中期和沙井文化的联珠饰，出现了“之”字形和多排联体的，器钮形制也发生了变化，从而适应了装饰腰带的需要。所以夏家店上层文化对东周时期长城沿线北方文化带的影响中最有意义的还是第二种情况，它的影响更为深远。第一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地域上的便利所形成的简单的传播，第二种情况则是由于社会生活方面的相似，才使得内蒙古地区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联珠饰继承并发展了下去。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内蒙古和沙井文化相似的这些文化因素，也出现在蒙古东部的石板墓中。东周北方文化带中不同文化吸收夏家店上层文化影响的不同情况很可能暗示了各族群之间的联系与区别⁵¹。

三

夏家店上层文化继承北方青铜器的渠道有三条：第一条来自长城沿线的商末青铜器；第二条来自当地燕山南北的商末青铜器；第三条来自年代大体同时的燕山南麓的北方青铜器。从这三条渠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末周初北方青铜器的主要流向：第一条是通过青铜盔、马镡和长体刀的分期与分布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是从南流黄河两岸——鄂尔多斯高原——燕山南麓——燕山以北——蒙古高原；第二条是以兽首刀的分析所呈现出来的，由燕山南麓——燕山以北；第三条是由白浮的管釜戈与钺等器物所表现出来的，也是燕山南麓——燕山以北。第二条与第三条路线相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二条是在商代晚期，第三条是在周代早期，说明了从燕山南北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始终有北方青铜文化的向北传播，而且不同时期传播的器物和其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是不同的。这三条路线的共性是从与中原相近的北方到与草原相近的北方，这暗示着中国商代晚期的北方青铜器很可能是起源于长城沿线。而且蒙古高原与中国北方的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有学者在研究卡拉苏克文化的冶金⁵²时提出卡拉苏克文化的冶金是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起源，然后一支向图瓦传播，另一支向蒙古传播，又从蒙古到鄂尔多斯，在鄂尔多斯形成次生冶金生产中心，然后向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传播，最后传到中原地区这样一种假说。但是这种假说还没有器物的年代学的支持。而我们分析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中的一部分来自长城沿线的商末北方青铜器恰好是与这个假说相反的传播方向，即从南向北的传播路线。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从南向北的传播证据就否认了从北向南的构想。但是这个证据可以说以兽首刀为代表的东部欧亚草原的分布不是从北向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也有草原传入的影响，例如立兽和柄部成排纹饰的刀或剑，我们将另文讨论。所以在讨论草原文化传播时应该具体到器物的年代、器形的演变以及具体的传播物的发现地点。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传播发展方向，而且同一时代不同的器物也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可以并存几种传播路线，不能够以偏盖全。所以欧亚草原东部地区 2 千纪的冶金与青铜器的生产与传播还有待更多的新发现。

最近读到库兹米纳的一本关于印度——伊朗人起源的新书⁵³，在谈到蒙古石板墓的青铜盔时，她认为石板墓有堆纹陶，而堆纹陶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特点（图九），所以青铜盔也是从安德罗诺沃文化传来，而且不仅到了蒙古，还传播到外贝加尔以及中国北方。但是从目前发现看，安德罗诺沃文化没有青铜盔，而且从上文对铜盔演变分析看，中国北方的铜盔中最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盔与蒙古石板墓的铜盔大体同时。而且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有两类铜盔，一类是中国北方的铜盔，一类是与欧亚草原有相似性的铜盔，蒙古高原目前发现的都是前一种，反映了蒙古高原与中国北方的密切联系，它们构成了欧亚草原最东端的一个青铜器分布区。



图九 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附加堆纹陶器

夏家店上层文化对后来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由近及远在逐渐递减,在最近的冀北东部只是一种简单的延续,并且逐渐消失。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联珠饰,在内蒙古地区和更西部的沙井文化经过改造成为一种腰饰牌。在甘宁地区这种影响只是零星的。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联珠饰也见于蒙古高原的石板墓文化中。这种饰牌分布的背后是否具有某种历史意义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是多元的,它以自身特色的釜柄剑和齿柄刀为主,并有中原文化的影响,部分地继承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传统,并吸收了草原青铜文化的因素。因此这个青铜文化才能达到如此高的青铜器制造的成就。在公元前 1 千纪初期的整个欧亚草原,只有图瓦地区的阿尔然大墓能够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发展水平相比,他们共同成为广义的斯基太时代骑马游牧文化的前驱者。

参考文献

- ¹ 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0 年 4 期。
- ² 保德青铜器群的划分详见杨建华、蒋刚:《公元前 2 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 年。
- ³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 年 4 期。
- ⁴ a 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0 年 4 期。
b 王彤:《中国北方商周时期铜胄》,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 ⁵ L. K. Galanina, Die Kurgane von Kelesmes <Steppenvölker Eurasiens> Band I Moskau, 1997
- ⁶ 以河北东南沟墓葬为代表,见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考古》1977 年 1 期
- ⁷ Erdene bataar, Buri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Bronze Age in the Territory of Mongolia<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Edited by Katheryn M. Linduff
- ⁸ 吉县文物工作站:《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85 年 9 期。
- ⁹ 杨绍舜:《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 年 2 期。
- ¹⁰ 山西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 年 8 期。
- ¹¹ 杨建华、Linduff, K.:《试论“勺形器”的用途——兼论晋陕高原商周青铜器的武装化与移动化》,杨建华,蒋刚主编《公元前 2 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地区》,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 ¹² 中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文化》,2006 年 143 页,图 47

-
- ¹³ 宁城县文化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东北考古专业:《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 ¹⁴ 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东京1997
- ¹⁵ 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东京199,图27
- ¹⁶ 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东京1997,图28
- ¹⁷ 韩金秋:《商周长体刀起源再研究》,杨建华,蒋刚主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地区》,科学出版社,2008年。
- ¹⁸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年12期。
- ¹⁹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器》,《考古》1978年6期。
- ²⁰ 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发现和收藏的商代青铜器》,《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 ²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图版六六,1,文物出版社,1980年。
- ²² 刘建忠:《河北怀安狮子口发现商代鹿首刀》,《考古》1988年10期。
- ²³ 建平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考古》1983年8期。
- ²⁴ 李殿福:《库仑、奈曼两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与内涵》,《文物资料丛刊》7。
- ²⁵ 王未想:《内蒙古林东塔子沟出土的羊首铜刀》,《北方文物》1994年4期。
- ²⁶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北方文物》1993年1期。
- ²⁷ 王峰:《河北兴隆县发现商周青铜器窖藏》,《文物》1990年11期。
- ²⁸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北方文物》1993年1期。
- ²⁹ 建平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考古》1983年8期。
- ³⁰ 杨建华:《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2期。
- ³¹ 建平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考古》1983年8期。
- ³² 王峰:《河北兴隆县发现商周青铜器窖藏》,《文物》1990年11期。
- ³³ 王占奎:《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
- ³⁴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4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 ³⁵ 赤峰市博物馆 宁城文物管理所:《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5期。
- ³⁶ 郑绍宗,中国北方的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年2期。
- ³⁷ 李逸友:《内蒙昭乌达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6期中图二:5,6。
- ³⁸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 ³⁹ 张家口市文管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
- ⁴⁰ 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青铜墓群》,《文物春秋》1993年2期。
- ⁴¹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年
- ⁴²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准格尔旗宝亥社发现青铜器》,《文物》1987年12期。
- ⁴³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 ⁴⁴ 郑隆:《大青山下发现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2期。

-
- ⁴⁵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匈奴墓》,《文物》1992年5期。
- ⁴⁶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 ⁴⁷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 ⁴⁸ 庆阳地区博物馆、庆阳县博物馆:《甘肃庆阳城北发现战国时期葬马坑》,《考古》1988年9期
- ⁴⁹ 宁城县文化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东北考古专业:《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文物资料丛刊》9,天巨泉M7301
- ⁵⁰ КО Н Н И В С А Д Н И К: В з г л я д С к в о з ь В е к а
МО С К В А 2003
- ⁵¹ 参见杨建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的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待刊)。
- ⁵² Sophie Legrand, *Karasuk Metallurg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fluence 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s* Edited by Kathryn Linduff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 ⁵³ E. 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Leiden Boston , 2007 见 Fig109: 19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 role of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Bronze complex of China

Yang Jianhua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was just between the late Shang — early Zhou periods and Eastern Zhou period. It inherited from northern Bronze of Late Shang along the Great Wall and Yanshan Moutain area, and bronzes of Early Zhou from south Yanshan Moutain. These three origins show distribution northward. .The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also had influence on Northern belt of Eastern Zhou period, such as eastern part and western part of North Hebei, Inner- Mongolia, and as far as Gansu. The analysis of the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role of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Bronze of China, we can see origins of some bronze of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 of different northern bronzes, and appreciate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bronze.

Keywords: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 Northern Bronze complex ;heritage

收稿日期: 2008-06-25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杨建华, 女(1955—),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